

Firm Multiple

Heterogeneity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企业多重异质性与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李军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Firm Multiple
Heterogeneity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企业多重异质性与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李军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企业多重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李军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668 - 1860 - 7

I. ①企… II. ①李… III. ①制造业—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国 IV. ①F42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9124 号

企业多重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QIYE DUOCHONG YIZHIXING YU ZHONGGUO ZHIZAOYE CHUKOU
JINGZHENGLI YANJIU

著 者: 李 军

.....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潘雅琴 梁嘉韵

责任校对: 黄志波

责任印制: 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62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3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变迁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研究”（编号：13YJC79007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出口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升级研究”（编号：15CGJ022）的资助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8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1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14
2	理论基础	15
2.1	新新贸易理论	16
2.2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24
2.3	“潮涌现象”理论	25
2.4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产业升级	27
3	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行为：中国制造业的再检验	33
3.1	梅里兹经典模型与生产率异质性	34
3.2	梅里兹经典模型的扩展	39
3.3	生产率异质性的实证再检验	44
4	多重异质性与出口行为：中国情境的理论发展与实证检验	67
4.1	出口企业多重异质性与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模型	68
4.2	出口企业多重异质性的理论内涵	71
4.3	出口企业多重异质性的实证检验	74

4.4	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抑或多重异质性：一个实证检验·····	98
5	多重异质性变迁与出口企业绩效·····	107
5.1	中国出口企业多重异质性的历史变迁·····	108
5.2	多重异质性变迁与出口企业绩效：澄海玩具产业集群的 案例研究·····	111
5.3	多重异质性变迁与出口企业绩效的实证检验：1998—2007 年 ·····	115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121
6.1	本书结论与政策含义·····	122
6.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25
附 录	·····	127
附录 1	文中用到的主要指标及其代码说明·····	128
附录 2	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各类出口企业数目及比例数据 ·····	129
附录 3	1998—2007 年各细分行业描述性统计表·····	143
附录 4	多重异质性描述性统计表·····	169
附录 5	多重异质性（内销为主 VS. 出口为主）比较结果表 ·····	185
附录 6	多重异质性变迁与出口企业绩效回归结果·····	189
参考文献	·····	197
后 记	·····	213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已经由改革开放初的贸易小国转变为世界贸易大国;同时,30多年来的国际贸易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据统计,1978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9 72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3 624.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397 983亿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了年均9%的增长率。随着全球产业的国际转移深化,以及中国大力引进外资政策的推动,大量制造业随之转移到中国,它们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经济和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江小涓,2002;江小涓、李蕊,2002;詹晓宁、葛顺奇,2002;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2006;张杰等,2009;易靖韬,2009;易靖韬、傅佳莎,2011;钱学锋、王菊蓉,2011;赵伟等,2011;邱斌等,2012),行业生产率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随之提升,与之相关的制成品贸易也于1990年转为贸易顺差,并逐渐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企业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遭遇了国内“潮涌现象”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洗礼,于是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严重分化,其企业层面异质性被不断放大。因此,忽视其企业层面异质性则难以理解中国制造业内部复杂的进出口贸易行为。具体来讲,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链条内部的较低位置,其经济发展常常是沿着现有的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不断升级,因而国际产业转移输入国的企业常常对哪一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出现“英雄所见略同”(林毅夫,2007a;林毅夫,2007b)。于是,在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偶然出现一次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就很可能像波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出现(林毅夫,2007a)。同时,在诸如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地

方政府部门利益推动等诸多因素（张军，1998；周其仁，2005；郭庆旺、贾俊雪，2006；周黎安，2004、2007）的强化下，这种“潮涌现象”在中国越演越烈，大量企业的涌入，使得企业竞争迅速由少量企业引入转向激烈竞争，甚至过度竞争；而相关行业也成为影响国际市场价格贸易大国的行业。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各个企业，而不是某个产业，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有的兴旺，有的衰败，有的艰难维生……

这些企业层面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学者们越来越相信源于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传统基于资源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理论和以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提出的基于规模经济、技术溢出等的新贸易理论难以解释这种企业层面的差异，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出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国际贸易的参与各方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则能增进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改进。传统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间贸易，但它忽视了产业内企业层面的差异，对产业内贸易、产业内仅有部分企业参与出口等重要事实都缺乏解释力。进一步地，新贸易理论认为，对规模经济性、异质性产品的追求导致了产业内贸易（Krugman, 1981）。但是，新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依旧是解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分工，因此其研究都假定，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在技术获取上是对称的，即企业之间具有相似的生产率水平与出口贸易水平，自然地，这里所指的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也是指一个国家特定产业具有的规模经济水平，所生产的特定的差异性产品。在这里，国际贸易学者在观察到一国产业内企业层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的情况下，比如美国最主要的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水平、创新、品牌、生产率、市场地位等差异，出于种种原因，依旧将这种差异粗略地概括为各个国家相关产业在（追求）规模经济和异质产品的差异。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一国同一产业内的出口企业之间与非出口企业之间，技术水平、创新、生产率、市场地位等企业层面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忽略了企业层面的因素，从而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出口，有的不出口，出口企业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在此背景下，循着伯纳德和詹森（Bernard and Jensen, 1995）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梅里兹的经典研究（Meltiz, 2003）将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行为建立起联系，近年来一批学者开始注重企业层面的因素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证实：企业的异质性与企业的出口决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生产率更高的企

业将选择进入国际市场,并获取更多盈利(Bernard and Jensen, 1999; Aw et al., 2000; Clerides et al., 1998; Meltiz, 2003; Eaton et al., 2004; Arnold and Hussinger, 2005; Cassiman et al., 2010)。这种从微观角度强调企业异质性的贸易理论被称为“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1.1.2 理论意义

(1) 新新贸易理论的中国化。

自伯纳德和詹森(Bernard and Jensen, 1995)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强调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其基本理论框架和基础性研究模型,其中梅里兹(Meltiz, 2003)模型是一重大基石^①。不过,由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还是一个新生理论,其研究对象(范围)、研究框架、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都还处于新生阶段,虽然在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Meltiz, 2003)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于企业异质性的众多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企业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是指企业在规模、建立年份、资本密集度、所有权、人力资本、组织方式、技术选择等方面特征的差异,综合体现为企业的生产率差异(黄静波, 2008)。于是,现有研究大多将企业异质性简化为生产率差异,或者简化为技术选择差异(实质还是强调生产率差异)。这种单一异质性的思想忽略了企业异质性的其他重要方面,以及这些异质性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武断地否定了多重异质性的价值。具体地讲,比如在无出口补贴的背景下,假定企业生产率差异外生和出口存在一个固定成本,则可以发现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出口,而较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不出口(Melitz, 2003)。但是,当这一模型置于大多数中国出口产业情境的时候,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无出口补贴的假设必须改变,对应地,出口与生产率、技术选择、出口学习效应、大国出口和定价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等原模型已假定不变的关系则需要重新考虑,而简单的静态分析可能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本书借助大规模(190多万样本)的微观企业层面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

^① 李春顶(2015)在文献综述中提出,新新贸易理论包括两类不同方向上的研究:一类以梅里兹(2003)为代表,主要探索异质企业的贸易、投资等国际化路径行为选择,又被称为异质企业贸易(Heterogeneous-Firms Trade, 简称HFT)理论(Baldwin and Okubo, 2005、2006);另一类以安特拉(Antras, 2003)为代表,主要探索异质企业的外包、一体化等全球生产组织行为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

综合分析和重新归纳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的的重要方面,结合中国情境慎重设定模型的前提条件,回归中国出口企业多重异质性与出口的动态变迁现实,指出影响出口贸易的企业异质性不是单一异质性,而是多重异质性;出口企业的关键性异质性并非一直是生产率差异,而是多重异质性变迁,从而发展中国情境下的新新贸易理论。

(2) 发展“潮涌现象”理论。

学术界最早关注到“潮涌现象”理论价值的是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先生。2007年,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林毅夫先生(2007a)在《经济研究》上撰文指出,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链条内部的较低位置,其经济发展常常是沿着现有的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不断升级,因而国际产业转移输入国的企业常常对哪一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出现“英雄所见略同”(林毅夫,2007a;林毅夫,2007b),从而出现严重的“潮涌现象”。

在后续研究中,林毅夫等学者通过“行业中企业数目不确定”阐明了“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林毅夫等,2010),并指出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在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输出国的发达国家鲜见的潮涌现象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国际产业转移输入国可能经常出现(林毅夫,2007a)。

正是因为投资“潮涌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是经常会出现的现象,因此,林毅夫(2007a)提出理论上应该重视这一现象,并呼唤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新革命。然而,新理论的建立和推广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不少紧密相关的研究、社会舆论都依然忽视了投资“潮涌现象”对中国实际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更是常常对其视而不见。比如,中国在产业升级投资上的“潮涌现象”自2003年以来一直十分明显(林毅夫,2007a;林毅夫,2007c),虽然中央政府曾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但不少省市的地方政府^①仍将全面推进产业升级作为其政策目标,社会舆论也一味强调产业升级的好处。在近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似乎中国所有企业都升级到各产业全球价值链的

^① 考虑地方政府以当地而非全国利益为目标,假设其他企业都位于产业价值链低端,而仅有该地区的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当然是有利可图的。但这一假设实质上依旧是忽视了投资“潮涌现象”的存在。

最高端，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指出，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盲目的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进一步地，考虑到“潮涌现象”的影响，李军和杨学儒（2011）发现，大国产业升级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一窝蜂式的产业升级（潮涌）将导致产业全球价值链随之发生演化，导致事倍功半！

本书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对哪一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因此必须放松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与企业投资相互无关，都接受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不受企业投资影响的暗含假设；而需要关注“潮涌现象”对相关产业的产业结构、国际市场价格、技术进步等重要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潮涌现象”使得企业异质性、产业结构和国家比较优势一起影响了国际贸易，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具体地讲，如企业规模、建立年份、资本密集度、所有权、人力资本、组织方式、技术选择等多重异质性成为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价格、市场地位的重要因素，而不再是所有出口企业获得给定的国际市场价格。进一步地，这里并不存在给定的国际市场价格，它是由国家比较优势和受“潮涌现象”影响的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的异质性共同决定的。总的来讲，本书将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潮涌现象”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分析中，结合新新贸易理论，发展“潮涌现象”理论的理论内涵、应用范围和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3）进一步明晰国际产业转移影响出口贸易的作用机理。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过程。国际产业转移既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兴起了一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产业转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生产技术的快速标准化，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从而使得跨国性生产和投资更加便利，全球性生产网络加速形成，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多方向、跳跃式的发展，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原有的产业梯度转移已逐渐让位于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全

球布点,产业集聚效应日益突出,产业转移方式趋于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仍占据主导地位,新兴外包市场日益活跃,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战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陆续出现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以赤松要为代表的雁型模式理论、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中心—外围”理论以及以小岛清为代表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多种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总的来讲,现有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产业层面,而忽视了企业出口层面。本书将结合新贸易理论,根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差异,将出口企业分成三类:与外商投资相关的企业(记为F类企业)、生而国际化的企业(Born Global Firm,记为G类企业)、先有本土市场而后国际化的企业(记为E类企业)。通过比较分析三类企业异质性与是否出口、出口竞争力的关系,将进一步明晰国际产业转移影响出口贸易的作用机理,特别有助于明晰企业差异性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发挥的作用。

1.1.3 实践意义

(1) 有助于明确大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和绩效的影响因素。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对象主要是国家或产业,在相关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常常借鉴相关理论来进行分析。不过,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常常忽略了一国相关产业的产业结构、有着巨大差异的企业主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实际上,在一国在相关产业成为国际市场的大国^①,由国际贸易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转变为价格影响者^②的时候,这种企业异质性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出来。比如在中国的很

① 中国是众多产业国际贸易中的大国而非小国的最直接证据就是:“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

② 经济学意义上市场价格的影响者与通俗所讲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有所不同。经济学认为市场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完全竞争市场的个体参与者对市场竞争没有任何影响力,是价格接受者;而在更接近现实的非完全竞争市场(并非必然是垄断市场),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的供给或需求变化会影响市场价格,这类参与者都是价格影响者。价格影响者并非一定可以获得对其有利的市场价格,这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博弈。通俗所讲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带有主观价值判断,拥有定价权者具备影响市场价格并获得对其有利价格的能力。比如,中国玩具产业作为世界塑胶玩具的主要供应商,中国供给会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和产品利润率;然而,由于中国玩具业“潮涌现象”和其他种种原因,以前博弈的结果是大量中国玩具企业被全球价值链俘获,获得非常不利的低价,此时,价格影响者们的博弈行动呈现出“囚徒困境”的特性。

多产业,出口企业 and 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之间的异质性非常大,以至于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一些企业生存艰难。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包含了企业层面的异质性,为理解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差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框架。本书通过梳理新新贸易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潮涌现象”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整合形成出口企业多重异质性变迁与出口企业竞争力和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这有助于明确大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影响因素,为出口企业提供借鉴。

(2) 提出中国出口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本书的分析框架不仅对大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注意到了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相关产业“潮涌现象”频发的现实背景,兼顾了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因此,基于此分析框架提出的中国企业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对策和政策建议将更具有可行性,可以供我国正在广泛开展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参考。

1.2 文献综述

本书是在中国情境下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实证检验。本书主要综述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传统贸易理论从产业和国家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认为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其生产不同产品会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上的差异,因而各国应分工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即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陈丽丽,2008;樊瑛,2007、2008a、2008b)。此时,国际贸易将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利益,从而增加社会福利。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研究者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这一简化的假设虽然有利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开展,但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的挑战: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等重要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换言之,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而非同质的,而且企业异质性对于理解国际贸易的动因至关重要。自伯纳德和詹森(Bernard and Jensen, 1995)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一些研究者创新性地以异质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单位,假设企业是异质的而非同质

的,认为企业异质性是企业出口行为、对外投资行为以及国际化生产组织行为的内在原因,从而初步发展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的概念最早由柏得温等人于2004年提出(Baldwin and Nicoud, 2004; Baldwin and Forslid, 2004),梅里兹(2003)、安特拉(2003)和伯纳德等(Bernard et al., 2003)等发表的顶级期刊论文是最早的代表性文献(李春顶, 2015)。因为这一理论流派聚集于企业层面差异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并由此揭示企业异质性与行业生产率、出口增长的关系,因此,新新贸易理论将有助于揭示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基础(李军、刘海云, 2015)。

目前,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获得了新新贸易理论必要性和合理性较为坚实的证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对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摩洛哥、墨西哥、哥伦比亚、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这些研究的一个总的结论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不仅如此,出口企业一般比非出口企业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这些普遍存在的企业层面的差异被称为企业异质性(Bernard et al., 2007)。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不仅企业异质性普遍存在,而且在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强调企业异质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赫尔普曼等(Helpman, Malitz and Yeaple, 2004)研究了大量的美国出口企业,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高出39%;而伊顿等(Eaton, Kortum and Kramarz, 2004)的实证检验则证实法国制造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有17.4%的企业参与出口,其出口量仅占其生产量的21.6%(陈丽丽, 2008; 樊瑛, 2008a、2008b; 黄静波, 2008; 赵君丽、吴建环, 2008)。由此可见,新新贸易理论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

(2) 明确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问题。

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在模型选取、贸易与生产率关系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和梅里兹(2003)不同,伯纳德等(Bernard et al., 2003)则是以多恩布什等(Dornbush, Fisher and Samuelson, 1977)的连续型李嘉图模型为基础的,但是其主要研究思想是统一的(陈丽丽, 2008; 黄静波, 2008),其研究问题也因此得以明确。总的来讲,新新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异质性对国际贸易(特别是是否出口)的影响,进一

步探讨企业异质性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变化 (Bernard et al., 2007)。

(3) 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模型, 并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跟进。

目前, 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模型主要是指比如和梅里兹 (2003) 和伯纳德等 (2003)。前者以荷普曼 (Hopenhayn, 1992) 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 通过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扩展了克鲁格曼 (1980) 的贸易模型; 后者则以伯特兰德 (Bertrand) 竞争模型而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 引入了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国家要素禀赋和产业要素密集度等方面的因素, 并假设存在可变贸易成本, 从而推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出口。这两篇经典文献发表以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跟进, Google 学术搜索显示, 截至 2015 年底, 前者的引用量约 9 000 次, 而后者也超过 2 500 次。后续的跟进文献进一步引出并探讨了新的理论问题, 比如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贸易究竟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即“出口中学习”还是“学习出口”问题)、其他企业异质性 (如技术创新、区位优势等)、企业异质性与竞争 (如 Chen、Imbs and Scott, 2009)、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国家层面因素的互动关系 (Bernard et al., 2007) 等。

(4) 国内学者的关注及其研究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 部分国内学者迅速跟进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陈丽丽 (2008)、樊瑛 (2007、2008a、2008b)、洪联英和罗能生 (2008) 等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脉络、经典模型和最新进展; 黄静波 (2008) 探讨了技术创新和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关系。不仅如此, 国内学者已经就中国数据对新新贸易理论展开了实证检验。比如, 钱学锋 (2008) 和钱学锋、熊平 (2010) 基于企业异质性研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问题; 刘志彪和张杰 (2009) 用江苏省 342 家本土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供应链、企业区位、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成长率、技术创新、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等异质性是否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因素; 而易靖韬 (2009) 则通过计量模型和浙江省 2001—2003 年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市场进入成本是否显著存在。结果发现, 市场进入成本显著存在, 因而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 同时, 产业特定的技术溢出和区位优势都能够提高企业的出口意愿。张杰、李勇和刘志彪 (2009) 则利用 1999—2003 年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出口中学习”或“学习出口”问题。

实际上, 这些研究不仅仅代表了国内学者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关注, 也

表明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刘志彪和张杰(2009)发现技术创新、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因素对大、中、小规模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但这些因素并不是影响小规模本土制造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而李春顶、尹翔硕(2009)和李春顶等(2010)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西方文献普遍支持的“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一结论在中国很多行业并不成立,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进一步地,国内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数据、不同的计量方法、不同的生产率计算方法、不同的数据分类等检验了“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和证据(Lu et al., 2010; 马述忠, 2010; Dai et al., 2011; 汤二子、刘海洋, 2011a; 范剑勇、冯猛, 2013; 聂文星、朱丽霞, 2013; 汤二子、孙振, 2012; 李建萍、张乃丽, 2014; 孙少勤等, 2014; Yang and He, 2014; 李春顶, 2015)。这表明,在中国背景下研究和发展新新贸易理论不仅仅需要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也需要特别注意中国背景下——“潮涌现象”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企业异质性的变迁及其特殊性;同时,这也表明在中国背景下开展企业异质性与出口企业竞争力的系统研究不仅仅是对西方理论的检验,更是构建融入了中国因素的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尝试,这也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3.1 研究思路

本书在系统分析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背景、理论脉络和模型建构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潮涌现象”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明确了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成立的前提假设,从而揭示在中国情境下发展新新贸易理论的可行方向。然后,本研究结合反映中国情境现实的理论进展,特别是“潮涌现象”理论和国际产业输入国与输出国的差异,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历史变迁,放松了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些不适宜假设,从而发展了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模型,提出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不是生产率单一异质性,而是多重异质性;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情境变迁而动态变迁,多重异质性的变